

桂岳书系之五

詹剑峰

学术论著选

上无过下老子其人。老子本是“遭遇”玄元圣祖。他本是以哲学思想来充实“为学”的隐君子，但后来竟被拉出来充塞道教的第一人，但后来竟成了道教的开山祖师——太上老君。他本是一个反对封建压迫的隐君子，但后来竟成了没落贵族思想的代表人物，是生活在春秋末期，但一会儿是周幽王时孔子的老师，一会儿是生于商王武丁九年，一会儿是生于周文王时，而现在是又在战国时期“博大真人”李耳。老子真可谓变化莫测了。

Z J F

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

桂岳书系之五
Z J F



詹剑峰

学术论著选

詹剑峰 著
张大松 选编

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
1997年·武汉

(鄂) 新登字 1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詹剑峰学术论著选/詹剑峰著; 张大松选编, - 武汉: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 1997.12

(桂岳书系)

ISBN 7-5622-1773-4/B·47

I. 詹… II. ①詹…②张… III. 哲学-中国-文集 IV. B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8159 号

ZHAN JIANFENG XUESHU LUNZHU XUAN

詹剑峰学术论著选

詹剑峰 著

© 张大松 选编

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武昌桂子山 邮编: 430079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责任编辑: 李良明

封面设计: 刘福珊

责任校对: 崔毅然

督 印: 朱 虹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张: 11.875 字数: 305 千字

版次: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1000

定价: 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向承印厂调换。

哲學史上所有哲學家，其身後遭遇的離奇者，莫過於老子其人。他本是「自隱無名而務」的隱君子，但後來竟被拉出來充當大唐皇帝——元玄聖祖。他本是以哲學思想來反對宗教的第一人，但後來竟成了道教的開山祖師——太上老君。他本是一個反對封建壓迫的哲人，但後來竟成了沒落貴族的代表人物。他本是生活在春秋末期，但一會兒是周幽王時代的賢者(一)，一會兒是生子高王武丁之九年二月十五日卯時(二)，一會兒是唐虞時代帝舜的老師(三)，而現在又是生於戰國時期的人物了。老子道地是「變化莫測的神龍」了。由此可見，老子在「老道」的筆下固然是神話中的人物，在「今儒」的筆下也是神話中的人物。一言以蔽之，鬼話連篇，所以要弄清老子的哲學思想，首先要掃除這類鬼話，剝去後人給老子披上的神化外衣，消除後人對老子妄加的歪曲，還他本來真面目。

據現存的先秦書冊，如「禮記」，「莊子」，「荀子」，

出版前言

华中师范大学是由华中大学、中华大学、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等院校改制、结合、发展而成，前后总共已有近百年的历史。它的前期校址主要是在武昌昙华林，50年代初迁到武昌桂子山。先后两处校园，林木蓊郁，四季花开，啾啾的鸟语应和学子的诵读，馥郁的花气溶渗清雅的书香。一个世纪以来，它所培育的英才，如茂林群芳，给祖国河山增色添彩。在这里工作过的教育家、革命家和各门学科的专家，为我们民族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们的经验与智慧，不但构成现代教育史、学术史中可贵的篇章，而且在今天和此后继续具有鲜活的启悟力，激励后人去思考、去创造。

每当我们回顾校史的时候，必然要回忆起循循善诱的老师们的音容笑貌，其中卓有建树的学者更使我们景仰。

30年代之初，一位著名的大学校长在他的就职演讲中说过，“孟子说：‘所谓故国者，非谓有乔木之谓也，有世臣之谓也。’我现在可以仿照说：‘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’”华中师范大学及其前身的师生名录中，不乏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大师，他们是群山中的五岳，众星中的北斗。例如，担任过华中大学理学院院长院长的桂质廷先生、卞彭先生，前任文学学院院长后任校长的韦卓民先生，中文系教授包鹭宾先生、傅懋激先生、游国恩先生，历史社会系教授许烺光先生，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建校委员会主任委员潘梓年先生，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杨东莼先生；又如，中华大学的校友王亚南先生、冯友兰先生。我们不仅一向以这些先生的名字为骄傲，更愿以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成果为榜样、为财富，从根本上强化学校的建设，使高等学校稳稳地站立在文化的峰顶，名副其实地、当之无愧地成为拥有和输送大师的园地。“桂岳书系”就是基于此种目的编辑出版的。现在推出的是第一辑，是在华中师范学院担任过教职的几位先生的著述，即杨东莼、韦卓民、钱基博、张舜徽、詹剑峰五位先生的学术著作选集；第二辑争取收罗范围有所扩展，收入在华中大学、中华大学等校和华中师范大学工作的优秀学者的著作。

前辈的成就是让我们仰止的高山，却绝不是一个极限。巨人总是愿意用自己的肩膀托起后来者，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。期望老一辈的鸿篇不断有新的知音，期望一代一代新的学人走进“桂岳书系”作者的行列。

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

1997年3月17日

自序

——我的治学态度

我一生读书、教书、著书，但并非出身书香门第，而是出生于一个小茶商之家。1923年，从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毕业后，考入国立西北大学。1925年，考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。1926年，赴法国半工半读，在巴黎大学研读西方哲学史。我研读时就是从疑出发，经过实证，然后直觉贯通，即怀疑—实证—直觉，我认为这种方法是很有有效的。

1932年回国后，我先后执教于安徽大学、苏皖政治学院等高等院校。先后讲授了哲学概论、逻辑学、西洋哲学史、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课程，撰写了《哲学概论》、《逻辑》、《西洋古代哲学史》、《西洋近代哲学简史》等教科书。由于所教课程较广泛，使我在一定程度上把一些有联系的学科结合起来进行思考，并从中注意中西文化的比较，这对我解

放后的著述是极为有益的。

解放后,我执教于湖北教育学院、华中师范学院。我的教学内容和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国哲学史和逻辑学方面。我总觉得,做学问要有踏实、虚心、有恒和勇敢的态度。

我一生学无专长,但颇务实,做人老老实实,做事切切实实,治学踏踏实实。毛泽东同志说过:“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,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。”我们著述,必须反对“洋洋大观,言无创新”;没有新思想、新观点,就不能动笔,一旦动笔就要深钻材料,潜心苦思,反复推敲。《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》,一九六二年已写出第二稿,当时出版社就决定出版,我仍坚持再改,直到最近才出版。

其次,学问浩如烟海,每个人的所知,只是太仓之一粟。语云:“器小易盈。”因之,唯虚乃能受,亦唯虚乃能容,而“有容乃大”。我的《墨家的形式逻辑》一书,出了两版,印了三次,同时在海外被翻印数次,在西德、美国、东亚行销,得到国内国际学术界的重视。严灵峰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哲学史丛书》(台中华书局出版)中的“墨子集成”在四十年来国内出版的多部墨学著作中,选入两部,本书有幸选入。《长江日报》评论本书进行了“开创性的学术研究”。《光明日报》的文章在书评中指出:“作者为重新评价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成就和地位,作出了积极贡献”,作者“坚持用今天的普通逻辑科学知识来评价和总结墨家的逻辑思想,而又不失其古代墨家思想的逻辑特点和民族特点,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逻辑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”。“这种尊重科学和尊重历史的治学方法,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”。海外发行过四版的《墨子研究》中说:“他在本书内不但驳斥了许多前人的错误,而且论证了先秦无后期墨家,墨经基本上是墨子自著,创立辩学(逻辑)者是墨子。这不仅推翻了已往学者,如梁启超、胡适之和冯友兰等人的旧论,詹氏更进而建立了墨家形式逻辑的体系。他视墨书为一整体,引证了墨书的其他篇章,来说明墨子一贯的逻辑体系,这是近代治墨学

者的一大进步。”李匡武教授认为,本书“有许多值得注意的见解;特别是《读墨余论》部分,论证颇详”。海外经墨学者对本书的《读墨余论》部分的重视,普遍地明显地超过了对本书古逻辑部分的重视。这些评论当然是对作者的鼓励。一部专著的出版,并不意味着对书中内容研究的结束;一部专著所受到的鼓励,也不意味着它的完美无缺。经过近二十年的思考,我发现书中有不少不足之处,就此继续研究,才写出了《墨子的哲学与科学》一书。

再次,做学问要把各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,但不是靠一时的心血来潮,今天研究这个,明天研究那个所能奏效的,必须坚持方向,持之以恒。我这几十年中虽学的内容、教的课程不少,但坚持把主要精力放在哲学史和逻辑学上,才略有收获。就是说,要博而能约、广而能深。

最后,做学问必须要有大胆的精神,敢于突破成见、成规、传统、权威的枷锁。学术界有许多权威之言,传统之见,这些东西并不都是好的。做学问贵在创新。我们常为成见所束缚,迷信权威。要做到勇敢,能够创新就需要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,相信真理的力量。我能够在著述中有些心得,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我的中西比较研究方法,眼里的材料多而可靠,心里当然就踏实得多,勇气也就有了。

上述态度,我不一定都做到了,但至少是应该这样做的。从这种态度出发,我力图贯彻“忠于史实、融贯中西、独辟蹊径”的学术风格,做一些有益有效的工作。

(摘自詹剑峰《我的生涯》)

目 录

自序——我的治学态度	(1)
老子其人	(1)
老子其书	(33)
老子之“道”	(65)
老子的“道纪”	(122)
墨子的宇宙论	(160)
墨子的认识论	(179)
墨家的形式逻辑	(191)
墨子的科学	(282)
驳“原始五行说”是朴素的唯物论	(302)

2 詹剑峰学术论著选

中国四行说初探	(337)
西方哲学史观	(350)
附录	(362)
詹剑峰传略	(362)
詹剑峰著作及主要论文目录	(365)
后记	(368)

老子其人

哲学史上所有哲学家中，就其身后遭遇之离奇者而论，实无过于老子其人。老子本是“自隐无名为务”的隐君子，但后来竟被拉出来充当大唐皇帝——玄元圣祖。他本是以哲学思想来反对宗教的第一人，但后来竟成了道教的开山祖师——太上老君。他本是一个反对封建压迫的哲人，但后来竟成了没落贵族思想的代表人物。他本是生活在春秋末期，但一会儿是周幽王时代的贤者^①，一会儿是生于商王武丁九年^②，一会儿是神农黄帝尧舜禹汤等帝王

① 高诱《吕氏春秋·重言篇注》：“老聃，周史伯阳也。三川竭，知周将亡。”

② 薛致玄《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开题科文疏》：“老子生于商王武丁之九年二月十五日卯时。”

之师^①，而现在又是战国时期“博大真人”李耳。老子真可谓是变化莫测的神龙了。由此可见，老子在“老道”的笔下固然是神话中的人物，即在“今儒”的笔下亦依然是神话中的人物。所以要弄清老子的哲学思想，首先要剥去后人给老子披上的神秘外衣，消除后人对老子妄加的歪曲，还他本来的面目。

一、老子在孔、墨后的由来

据现存的先秦及两汉的书籍，如《礼记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韩诗外传》等，都肯定老子是一个哲学家，生活于春秋时代，与孔子同时而略先于孔子，毫无异说。

《史记》为老子立传，虽有“以疑传疑”之辞，然终肯定老子为隐君子。迨唐韩愈始痛斥孔子师老子之说，宋儒始疑老子其人，清儒汪中、崔述乃申其说，今儒梁启超、冯友兰等乃肯定老子在孔、墨之后，战国时人。

自汉武以后，孔子已成了儒家的教主，不幸还有一个老师老聃压在孔子头上，卫道的儒者当然要气得发抖，如韩愈就曾愤愤不平地说：“老者曰：‘孔子，吾师之弟子也’。……为孔子者，习闻其说，乐其诞而自小也，亦曰：‘吾师亦尝师之云尔。’”（《原道》）近人批评韩愈“卫道有心，论辩无据”（罗根泽：《古史辨》第六册自序）。其实韩愈还是老实人，不若“今儒”之捏造史实，而美其名为“大胆假设”。

^① 杜光庭《道德真经广圣义》：“老君历代下降，为帝王师：伏羲时号郁华子；神农时号大成子；祝融时号广寿子；黄帝时号广成子；颛顼时号赤精子；帝喾时号录图子；尧时号尹寿子；禹时号真行子；汤时号锡则子。”这一神话乃据《韩诗外传》“五帝亦有师”编造出来的。

其后宋儒叶适指出：“孔子赞其（指老子）为龙，则是为黄老学者，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辞也”，并断定“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，而为此书者，必非礼家所谓老聃，妄人讹而合之尔”^①。黄震则直谓：“老子之书，必隐士嫉乱世而思无事者为之。异端之士，私相推尊，过为诬诞。”（黄震：《黄氏日抄》，现引自张心澂《伪书通考》）但头脑清醒的儒者尚能实事求是，作出正确的结论，如《朱子语类》载：“郭德元问：老子云，‘夫礼，忠信之薄，而乱之首’。孔子却又问礼于他，不知何故？文公曰：他晓得礼之曲折。某初间疑有两个老聃，横渠亦意其如此。今看得来不是如此。他曾为柱下史，于礼自是理会得，所以与孔子说得如此好。只是他又说，这个物事不用得亦可，一似圣人用礼时，反若多事，所以如此说。礼运中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语，便自有这个意思。”（彭耜：《道德真经集注杂说》）朱子说得如此明白，然而近人仍说“朱熹怀疑老聃的教训孔子”，此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。

近代怀疑老聃其人者，有毕沅、汪中、崔述，然其说并不为人所注意。迄 1922 年，梁启超首先以六个可疑，说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的嫌疑（梁启超：《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》），其后，钱穆用几个偶见于古籍的人名，瞎缠一通，竟否定老子这个人，其言之荒谬离奇无异杜光庭《释老君事迹氏族降生时代》的荒诞无稽（钱穆：《老子杂辨》，载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》）。还有冯友兰以三个丐词作为论据，遂把老子列入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的学派（冯友兰：《中国哲学史》）。当时推梁氏之波逐冯氏之澜者，尚有七八人。梁氏以“疑古”“考信”的新面目论证老子在孔墨之后，然夷考其实，却是儒者一脉相承的旧道统观念的表现。盖梁氏私意欲推孔子为中国学术的“元始天尊”，其由来已久。他知道，

^① 叶适：《习学记言》，现引自张心澂《伪书通考》。

如果只照老办法力辩老子非孔子之师，实不足取信于人，于是投“疑古”之机，怀疑老子其人其书是出现于春秋时代，以达到“尊孔”的目的。钱穆和冯友兰的私意亦然。试举其证。

梁启超在其所拟《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目录》中：第146课，先秦学术《儒学》。第147课，其二《道家》。第148课，其三《墨家》。第149课，其四《法家》（梁启超：《梁任公近著》第一集）。

钱穆说：“时余治诸子，谓其渊源起于儒，始于孔子，而孔子之学见于《论语》、《春秋》。《易系》非孔子书，老子不得在孔子前。”（钱穆：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跋》）

冯友兰所著的中国哲学史，始于孔子，终于廖平的经学。在冯友兰笔下，一部中国哲学史竟成了一座儒家思想发展史，孔子及其苗裔在中国学术史上竟如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。稍后，冯氏著《新理学》，毫不讳言，他讲新理学是接着宋儒讲的。他隐然以继承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以及周、程、张、朱一脉相承的道统自命，并以为“当时的王者师”自期许。

由此可见，孔先老后，表面上是一个古书考伪问题，骨子里是儒者为孔子争“元始天尊”的地位。

记载老子事迹较多的古籍是《史记》、《庄子》及儒家的《礼记》、《孔子家语》。现从这三方面来考察。

二、从《史记》检证老子其人

近人推断老子其人及书是出现于战国，其论据多本之于汪中和崔述。而汪中和崔述所怀疑的及其所提出的假设又多依据《史记》。所以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《史记》。

(一)《史记》有关老子的记载及对这些记载的分析

“老子者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（伯阳，谥曰）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孔子适周，将问礼于老子。老子曰：‘子所言者，其人与其骨皆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、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者，若是而已。’孔子去，谓弟子曰：‘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网，游者可以为纶，飞者可以为矰。至于龙，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！’老子脩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。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关，关〔令〕尹喜曰：‘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。’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。（莫知其所终）或曰，老莱子亦楚人也，著书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，与孔子同时云。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，或言二百余岁，以其脩道而养寿也。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，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，曰：‘始秦与周合而离，离五百岁而复合，合七十岁而霸王出焉。’或曰，儋即老子，或曰，非也。世莫知其然否。老子，隐君子也。老子之子名宗，宗为魏将，封于段干。宗子注，注子宫，宫玄孙假。假事于汉孝文帝，而假之子解为胶西邸太傅，因家于齐焉。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，儒学亦绌老子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岂谓是耶？李耳无为自化，清静自正。”（《老庄申韩列传》）“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，请与孔子适周。鲁君与之一乘车、两马、一竖子。俱适周，问礼，盖见老子云。辞去，而老子送之曰：‘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，仁人者送人以言。吾不能富贵，窃仁人之号，送子以言曰，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，好议人者也。博辩广大危其身者，发人之恶者也。为人子者毋以有己，为人臣者毋以有己。’孔子自周反于鲁，弟子稍益进焉。”（《孔子世家》）

“孔子之所严事者：于周则老子；于卫蘧伯玉；于齐晏平仲；于

楚老莱子；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。”（《仲尼弟子列传》）

现在分析《史记》原文。首先须指出现存老子传，有的地方已被后人窜改，如“字伯阳，谥曰聃”，原文是“字聃”，“伯阳、谥曰”四字是后人妄加。这是姚鼐和王念孙所确切证明的^①。我据此类推，可能“莫知其所终”五字亦后人所妄加。因为庄子已述到“有老聃者，免而归居”（《天道篇》）。“老聃死，秦失吊之”（《养生主篇》）。司马迁家传“道论”，当熟读《庄子》，焉有不知之理。据唐史，唐室尊老子为元玄圣祖，移《史记》列传以老子为首。唐明皇曾明令：“其老君传内，折出韩非，不与令同传。”（杜光庭：《道德真经广圣义》）而杜光庭疏：“马迁谓之隐君子”时，有“西入流沙，不知所终”之语（杜光庭：《道德真经广圣义》卷三）。我据此猜度“莫知其所终”一语，乃后人附会老子西行化胡之说造出来的，唐时乃窜入老子传内。

第二须指出《史记》没有说定的事，后人加以解释，因而引起无谓的纷争。如《老子传》“乃遂去，至关”，这关在《史记》并没有指定何关，任何周境之关都可。而后之注解者，乃断为函谷关，其后又西推至散关，此则与老子西入流沙之说有关联。又如《孔子世家》“孔子适周，问礼，盖见老聃”，并没确定何一年，而后世之学者想象孔子只能与老子会过一次面，因而适周之事亦大起纷争。

第三须指出《史记》载老子告孔子之言，确与老子的思想相符合，但不合小儒迂拘之见，遂被断为“托诸老聃以诎孔子”者。如崔述说：“孔子骄乎？多欲乎？有恣色与淫志乎？深察以近死而博辨以危身乎？……由是言之，谓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，妄也。”（《洙泗考信录》）

最后须指出，《史记》常于某一系列传内突然插入另一个人，附之以传世。如《孟子荀卿列传》末插上“盖墨翟，宋之大夫，善守御，为

^① 参考姚鼐：《老子章义序》。王念孙：《史记杂志》。